

專輯論文

交換、信息與權力： 美國「中國通」社交媒體社會網絡研究

相德寶、曹春曉

摘要

「權力根源於交換」。基於交換網絡理論，本文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法對111位記者、智庫、學者和官員四種類型的美國「中國通」信息交換網絡權力結構進行考察。研究發現，(1) 不同類型中國通在社交媒體Twitter上建立了緊密連接的信息資源交換網絡。相較於智庫研究員、高校學者和政府官員，記者型中國通子網絡密度最高，連接最為緊密；(2) 美國中國通社交網絡呈現明顯的「核心—邊緣」結構，記者、學者型中國通多佔據核心，智庫、政府官員型中國通多位於邊緣；(3) 美國中國通信息交換網絡分為三個模塊，各模塊由不同類型的中國通主導。其中，記者—學者構成的模塊佔據了整個信息交換網絡的主體。整體而言，作為新型信息交換媒介平台，社交媒體已成為美國中國通

相德寶，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興趣：新媒體、國際傳播、計算傳播。電郵：xiangdebao2000@163.com

曹春曉，上海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研究生。研究興趣：新媒體、國際傳播、計算傳播。電郵：aimoca1234@163.com

論文投稿日期：2021年2月1日。論文接受日期：2021年8月9日。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權力生成的制度性基礎，記者型美國中國通形成了當代美國中國通信息交換網絡權力優勢。

關鍵詞：美國「中國通」、社交媒體、權力結構、交換網絡理論、社會網絡分析

Special Issue Articles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Power: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U.S. China Hands

Debao XIANG, Chunxiao CAO

Abstract

“Power stems from exchange.” Directed by Exchange Network Theory (ENT), this article adopts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to investigate the power structure of the U.S. China Hands information exchange network, which is comprised of 111 journalists, think-tankers, scholars, and official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different types of China Hands have established a tight-knit information resource exchange network on Twitter; (2) compared with think-tankers, university scholar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journalist China Hands have formed a closely connected community and achieved the highest network density; (3) the U.S. China Hands social network presents an apparent “core-periphery” structure, with journalists and scholars occupying the core, while think tanks and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on the fringe; and (4) the information exchange network of the U.S. China Hands is divided into three modularities, which are dominated by different types of China Hands. China Hands of journalist occupy the main body of the entire information exchange network. On the whole, as a new type of media platform for information exchange,

Debao XIANG (Professor).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new media, global communication,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Chunxiao CAO (PhD Candid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Research interests: new media, global communication, computational communication.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social media has become the institutional basis for the U.S. China Hands; here, journalists have gained a competitive edge of information power over other types of U.S. China Hands.

Keywords: the U.S. China Hands, social media, power structure, exchange network theory,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itation of this article: Xiang, D., & Cao, C. (2022). Exchange, information, and power: A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of the U.S. China Hands.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59, 119–146.

致謝

本文為上海市社科規劃年度課題《全球中國通國際社交媒體中國觀、影響路徑與引導策略研究》(項目編號:2021BXW011)及國家社科重大項目《中國特色對外話語體系在英語世界的譯介與傳播研究(1949–2019)》(項目編號:19ZDA339)前期研究成果。本文初稿曾在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作為數據和方法的數字媒體」工作坊宣讀,感謝工作坊主辦方、與會同仁、匿名評審者和編輯提供的寶貴修改意見。

作為專業從事中國學的專家，美國「中國通」(China Hands / Experts / Watchers / Specialists)在美國對華決策過程中，以其廣泛的信息來源、深入的調查洞見，往往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主要定義者」(Anstead & Chadwick, 2017)。後疫情時代，美國仍視中國為其經濟、政治，甚至意識形態方面的戰略競爭者(Yuan & Fu, 2020)，現任總統拜登稱中國是美國「最嚴峻的競爭對手」(most serious competitor)(Biden, 2021)。因此，涉及到對華政策時，以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為代表的當代美國中國通再一次受到華盛頓的重視(Schreckinger & Lippman, 2018)。

作為專業意見領袖，美國中國通因共同關注涉華問題形成獨特的社群，其內部存在著職業聲望、地位，甚至話語權力的差異(Thomson, 1971)。從交換理論的視角來看，此種權力的差異源於中國通各自佔有社會資源的不同而導致的信息交換鴻溝——越是擁有較多涉華信息資源並積極表達觀點的美國中國通，越傾向擁有較強信息交換權力，也因此影響美國涉華政策制訂中起到越重要作用。傳統媒體時代，此類關鍵意見領袖一般以美國政府高層官員如基辛格(Henry Kissinger)、頂尖高校學者如傅高義(Ezra Vogel)，以及眾多太平洋司令部軍方人士的權力精英為主(Mills, 1956)，他們利用自身人際傳播網絡影響美國涉華政策制定。新興社交媒體重構了各種信息資源，為美國中國通提供了新的傳播渠道。除20世紀60至70年代活躍的官員型中國通和學者型中國通外(馬建標、楊康書源, 2018)，不同類型中國通積極開設社交媒體帳號，打造個人品牌，輸出觀點，在擴大自身政治、社會聲望的同時，也整合並間接引導著美國國內涉華輿論(王莉麗, 2017)。

國內外有關美國中國通的研究可分為群像研究和個體研究。群像研究多聚焦某一特定歷史階段湧現的中國通群體，如美蘇冷戰時期(張威, 2006; Mark, 2005)，中美關係「大解凍」時期(Schmalzer, 2009; Thomson, 1971)，從國際關係、跨文化傳播等角度研究該段時期美國中國通群體湧現的原因及對中美關係的整體影響。個體研究則關注中美關係中具有特殊影響力的典型美國中國通，考察其獨特的個人經歷，對華觀點產生的原因及對中美關係的影響，對其在中美關係中的歷史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地位和影響進行評判(呂增奎, 2015; 梁怡、王愛雲, 2010; 黃濤, 2019)。上述研究呈現典型的歷史與現實的偏向, 且較少回應美國中國通群體內部的關聯式結構、特徵等問題。

互聯網和新型社交媒體的崛起顛覆了傳統的社會權力結構, 去中心化一再中心化成為重要的歷史特徵。社交媒體時代, 美國中國通群體不斷擴大, 美國中國通群體內部呈現新的權力分化和權力結構。受限於特定的歷史背景以及傳統的美國中國通研究範式, 這些嶄新的研究問題並未得到關注和回答。得益於社交媒體海量、可供計算的關係數據, 以及計算傳播研究範式的興起, 本文嘗試對以上問題予以回答。具體而言, 本研究關注的核心問題有: 社交媒體時代美國中國通在社交網絡的權力結構如何? 哪些中國通擁有較高權力, 主導著群體內的涉華信息交換? 基於交換網絡理論(Exchange Network Theory), 本研究嘗試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法對以上問題進行研究。

文獻探討與研究假設

美國「中國通」研究

美國「中國通」最初是指一些能夠影響二戰期間美國對華政策的美國外交人士、記者以及士兵(Mark, 2005)。目前有關美國「中國通」的文獻多集中於某個歷史階段。其中, 對20世紀70年代集體湧現的中國通及出現原因的解讀是當前文獻關注的重點。如湯姆森(Thomson)(1971)指出, 1971年中美關係「大解凍」, 尼克森政府為中美關係正常化而尋求專業諮詢, 使得當初受「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影響的美國中國通群體重獲新生。湯姆森將中國通劃分為兩類: 一類來自政府高層機構; 另一類來自專職觀察中國的商會、組織機構以及高校。前者對於美國涉華政策的影響力更強, 尤其是在台灣問題上; 也有研究指出中美關係的恢復也催生眾多「業餘美國中國通」, 他們一般是科學家或者激進主義者, 由於他們在華的親身經歷, 便被人尊稱為中國「專家」(Schmalzer, 2009)。此外, 美國中國通的文獻還集中於研究冷戰期間, 被美國國內「麥卡錫」主義迫害的群體命運(張威, 2006), 以及該時期

寄居在香港，為執行美國政府冷戰政策的美國中國通 (Mark, 2005)。此時的美國中國通大體分為兩類：一類是處理涉華事務的職業外交官，如約翰·S·謝偉思 (John S. Service) 等人；另一類是以鮑大可 (A. Doak Barnett) 和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為代表的學者型中國通 (馬建標、楊康書源，2018)。

除對美國中國通的群像研究，當前大多數文獻更多聚焦於部分著名的學者型中國通個體。其中，美國中國學研究的「開山鼻祖」(Cohen & Goldman, 1992)——費正清最受研究人員的青睞。有研究認為費對中國的觀察和論述，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20世紀60年代中美關係的進程 (黃濤，2019)。沈大偉 (David Shambaugh) 因其著名的「中國崩潰論」(The Collapse of China) (Shambaugh, 2015) 使中國共產黨在世界範圍內遭受批評，也吸引了眾多中國學者的注意，這些研究大多是從批判主義視角出發，論述沈大偉主張的不合理之處 (呂增奎，2015；梁怡、王愛雲，2010)。此外，現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高級國際研究學院教授及該院中國研究系主任蘭普頓 (David Lampton)，同樣是中國學者研究的重點，且多集中於對蘭普頓涉華觀點、立場的介紹以及評論 (唐昆凡，2014)。其他美國中國通如傅高義 (Ezra Feivel Vogel) (孫中欣，2009)、李侃如 (Kenneth Lieberthal) (李原，2009)，以及卜睿哲 (Richard C. Bush) (姚瑤，2010) 等，因其在中美關係領域的重要影響力也成為研究重點。

總體來看，國內外美國中國通研究均呈現明顯的歷史和現實的偏向，多關注政府官員、高校學者型中國通，重點考察美國中國通群體和個體對中美關係的影響，而對新媒體時代社交媒體對美國中國通在中美關係的信息交換以及權力的生成缺少研究。

交換網絡理論

1972年，愛默森 (Richard M. Emerson) 繼承齊美爾 (Georg Simmel) 的形式社會學，綜合行為主義心理學與社會網絡分析，提出了交換網絡理論。該理論的目的是測定社會網絡，即行動者之間的聯結模式，是如何影響權力的分配、運用和平衡 (特納，2006)。這裡的權力定義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仍舊屬於交換理論的範疇，即權力根源於交換關係 (Cook & Emerson, 1978; Emerson, 1962)。對此，愛默森給出的解釋是，人們由於擁有資源的不同 (這種資源包括物質、符號以及情感)，導致人們需要進行各種形式的資源交換而滿足自身需求，實現各自的目標。在交換的過程中，參與交換的一方由於缺乏資源會對另一方產生依賴，權力關係由此產生。而這一理論的心理學基礎是，假設人們是理性的。因此總體來看，隸屬於社會交換理論的交換網絡理論，其邏輯框架可以歸結為：理性選擇—社會交換—資源差異—權力關係 (Cook et al., 1983; Emerson, 1972)。

愛默森的交換網絡理論與以往交換理論所不同的是，他將以往研究中只關注二元/對偶 (dyads) 分析擴展到囊括更多行動者的網絡化分析，不僅關注行動者自身的屬性與特徵，且更加關注行動者之間關係形成的機制 (特納，2006)。根據關係屬性的不同，行動者之間的關係網絡大致可以分為單邊壟斷、勞動分工、社交圈和分層網絡四個維度，其中社交圈指行動者群體內某一交換越是表現為同類交換的形態，交換關係越有可能變得封閉。分層網絡則指資源越是等價且在一些行動者之間的分配越是不平等，這一網絡根據資源多少分層的可能性就越大，處於同一水準的行動者形成封閉交換網絡的可能性也越大。

有研究指出，愛默森的交換網絡理論之所以更具有生機，是由於以上理論假設聚焦了更多元的行動者，包括個體、大型機構，甚至民族國家，這使得其分析物件更加廣闊 (Cook & Whitmeyer, 1992)；另外，也更加關注多個行動者之間勾連的關係屬性及分化形態，如多個體交換過程中形成的壟斷、分層關係，更貼合實際地刻劃了社會關係、結構的本質 (特納，2006)。以往研究應用該理論進行分析的物件包括線上網絡個體，如社交媒體用戶 (Hsieh & Leeb, 2020)、遊戲玩家 (Huang et al., 2018) 以及公司、組織等 (Laumann, Knoke, & Kim, 1985)。研究的主要內容是討論何種因素影響交換網絡的生成與維持，以及怎樣的交換結構會影響網絡整體性 (Han, Kim, & Lee, 2019)，但對於交換的最終結果，即資源交換生成怎樣的權力結構，並未展開充分研究。

交換網絡理論與社會網絡分析

研究方法上，交換網絡理論與社會網絡分析法有著天然的適配 (Mitchell, 1974)。Kapferer (1972) 甚至認為交換理論「最適合進行網絡分析」。20世紀80年代，研究人員就意識到「網絡與市場或交換理論之間的聯繫…… (以及) 二者如何將個人與更大的社會結構聯繫在一起」 (Collins, 1988)。二者之所以適合，首先是因為二者出發點都是為了分析社會結構的本質。交換網絡理論提出假設，社會網絡分析提供具體的測量指標與參數。其次，二者均關注結構的分化究竟會帶來怎樣的結果。交換網絡理論提出壟斷、社交圈、分層的概念，社會網絡理論則有核心—邊緣分析、凝聚子群分析等算法模型，以數學化、視覺化的形態將這種抽象概念更加直觀呈現，二者高度貼合。

但二者並非在任何情況下都適用 (Cook & Whitmeyer, 1992)。作為交換理論的更高形態，交換網絡理論更加注重多個行動者之間關係的闡述。歸納起來，該理論重點強調行動者的交換行為受到利益或回饋的驅使；行動者大部分進行的互動都是有價值的互動，包括物質、符號以及情感等。換言之，若要對那些自發的、無價值的社會互動進行網絡分析，交換網絡理論並不能彰顯出足夠的解釋力。

對於社交媒體上的行動者之間的互動，卡斯特 (2018) 認為網絡社會，人們超越了時間和空間，他們生產的內容間建立了連結，串聯起實踐，而內容生產需要意義的分享。從交換網絡理論視角來看，具有內容的傳播必然是帶有價值的傳播，分享則是行動者的驅動力。而僅僅是媒介使用行為，也同樣包含著具有價值的交換。比如，評論偏向交換觀點，點讚偏向交換情感；轉發則偏向交換認可度，關注則意味著與對方進行所有有關自身信息流的交換。因此，對於社交媒體上使用者的媒介行為，可以認定都是信息資源的交換，是有價值的交換。

對於不同類型的美國中國通而言，因社交媒體建立連接，發生互動，但由於各自信息資源的不同以及交換頻度的差異而會產生權力的差異。根據交換網絡理論有關社交圈和分層的假設，本文提出第一個研究假設：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1. 由於擁有更多的信息資源，記者型美國中國通交換網絡密度大於高校學者、智庫研究員以及政府官員中國通。

根據交換網絡理論，網絡中各行動者一旦基於交換產生了權力，具有資源優勢的那一方會開始運用權力，從而降低或剝奪其他行動者的資源或權力，因此，在交換網絡中總是存在較高權力，或者某個體擁有絕對權力(Emerson, 1962, 1972)。對於美國中國通群體，我們認為在他們的信息交換網絡中同樣存在具有優勢的小群體，他們擁有支配網絡中其他行動者的權力或信息資源。

文獻顯示，有組織的利益集團、知識共同體、公眾以及面向國際的商業領袖是塑造美國外交政策的主要參與者。對於有組織的利益集團，成員可以通過干涉投票流程、發起社會運動，甚至呼籲罷工來形成替代性的外交政策影響相關政客，發揮其影響力(Jacobs & Page, 2005)。但是，此類研究忽略了社交媒體這一變量。因為新媒介賦權功能，原本處於信息資源匱乏的一方有可能脫離邊緣，進入中心，佔有交換主動權，獲得網絡權力。正因如此，記者類中國通群體則在新媒介環境下獲得更大權力——外交政策決策者似乎在外交政策上進行客觀闡述的範圍減小了，而被迫迎合解決記者所提出的任何問題(McNulty, 1993)。此外，與智庫研究員、高校學者和政府官員相比，記者擁有更多元的故事敘述技巧，更廣泛的新聞來源，更豐富的跨領域知識，以及更好的新媒體素養，這意味著記者型美國中國通實際上會在社交媒體中佔取更多信息資源。正如之前的一項研究顯示，美國記者已經「全心全意地擁抱社交媒體」以建立社交網絡和自我推廣機制，而社交媒體反過來又使新聞界更有公信力(Weaver & Willnat, 2016)。因此，本研究提出第二、三個研究假設：

2. 相較於高校學者、智庫研究員和政府官員，記者型美國中國通更傾向佔據網絡核心位置。

3. 由於不同類型中國通佔有信息資源的差異性，美國中國通內部會分化出不同模塊(modularity)，擁有更多記者型美國中國通的模塊將成為權力關鍵模塊。

研究方法

社會網絡分析法

本研究採用社會網絡分析法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該方法主要分析社會網絡結構以及結構中關鍵行動者 (actor) —— 通過收集社會關係中隱性 (implicit) 或顯性 (explicit) 關係、屬性資料，構建視覺化網絡圖，把握信息的傳播走向，以及行動者的結構位置 (García & Segado, 2016)。因此，社會網絡分析被廣泛應用於社會學、心理學、計算機科學、新聞傳播學等多學科領域。

社會網絡分析具有定量研究的優勢，常用的分析指標包括：(1) 中心性 (centrality)；(2) 中心勢 (centralization) (Scott, 2000)。其中，中心性主要針對單個節點的測度；中心勢是對整個圖的總體凝聚力或整合度進行測量。和中心勢相互補充的量度還有網絡密度 (network density)，用來衡量社會網絡的整體凝聚力水準。中心性是對社會網絡結構、關係和權力的一種描述和量度。通過社會網絡中心性分析可以直接找出在整個社會網絡中最具影響力的節點。中心性的觀察指標主要有度中心性、接近中心性、仲介中心性和特徵向量中心性、權威中心性等。

多數研究通過度中心性指標描繪信息資源在某個節點的聚集情況，但交換網絡理論學者指出，簡單的度中心性指數並不能很好地體現一個節點在網絡中的權力位置，因為它只反映了與該節點直接相關的連接數，對於間接預期產生連結的節點則被忽略，而這些節點恰巧也可能位於一個節點權力範圍 (Cook et al., 1983)。因此，有學者提出權威中心性指標。所謂權威中心性，是由節點的入度所體現。具體而言，一個節點被稱為權威 (authority) 節點，意味著該節點擁有更多指向它的連結，而這些連結是由擁有許多出度的樞紐 (hub) 節點發出。權威節點的值越高，說明受到樞紐節點的推薦性越高，在信息傳播方面，便指權威節點所發信息是高度可信的，更值得推薦，換言之，更具有交換的價值。因此，權威中心性可以更好地識別社交網絡中的關鍵節點 (Kleinberg, 1999)。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所以，作為一種更好地衡量網絡圖中節點信息傳播資源優勢的指標，本研究採用權威中心性來表示美國中國通群體內部的個體結構位置、權力分佈情況。

研究對象與數據收集

本文選取Twitter作為研究對象，這是由於該平台是七成美國成人的新聞獲取平台(Hughes & Wojcik, 2019)；能夠提供大量的人際關係信息，例如關注關係、推文轉發和點讚等資料(García & Segado, 2016)；且Twitter已發展成為由URL分享，最新消息展示和信息推介的聚合平台(Anger & Kittl, 2011)。在該平台上，名人、媒體和政治人物等具有影響力的用戶不斷地對數百萬被動用戶，或很少在網上發佈信息的使用者施加影響。

本研究在初步考察了美國中國通的職業背景後，發現美國中國通背景多元，領域廣泛。大體可以分為高校學者、智庫研究員、政府官員、媒體記者四類，涉及政治、經濟、軍事、中美未來戰略四個領域。因此，本研究採取立意抽樣(purposive sampling)研究方法——根據外交學院2015年發佈的〈美國知華派評估報告〉以及以往中國通研究中出現的個體樣本，同時通過檢索國際媒體上就中國問題發表觀點的信源名稱，在Twitter上逐一搜索其個人帳號，最終篩選出總計111名美國知名中國通名單。包括高校學者35人；智庫研究員33人；記者32人；政府官員11人。

本文通過python程式抓取111位美國中國通帳戶的彼此關注資料，建立網絡矩陣，結合社會網絡分析軟體ORA、UCINET、Gephi進行社會網絡分析。

研究結果

記者型美國中國通子網絡密度最高，但並不具備統計學意義上的相關性

社會網絡分析中，網絡密度是衡量社交網絡是否緊密的重要指標。網絡密度可以反映網絡凝聚力的總體水準，能夠展示網絡行動者聯繫的緊密程度以及信息交流的積極程度。網絡密度值介於0和1之間，越接近1則代表彼此間的關係越緊密，圍繞某個行動者的聚合性越高。111位美國中國通在社交媒體 Twitter 上形成緊密連接的社會網絡，網絡間共有4,940條連線，全部為雙向連接，互惠性強。

美國中國通群體內社交媒體網絡密度為.36，與此前全球政治領導人(.04)、智庫(.15)、媒體(.01)、報紙(.01)的社會網絡密度相比較(相德寶、張文正，2017a，2017b，2018；相德寶、樂文婉，2019)，美國中國通社會網絡密度最高，連接最緊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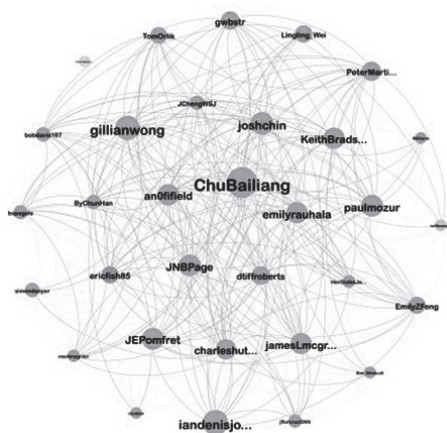
從不同類型美國中國通個體網絡來看，記者型美國中國通社會網絡中，共有32個節點，385條連線，網絡密度.78，網絡平均路徑長度1.224。該群體的社交網絡密度最高，網絡平均路徑長度最短，說明中國通媒體記者群體各成員緊密連接在一起，並且信息互換效率最高，平均只需經過1.224個節點，充分體現記者信息聯通的職業特性。其中，信息資源優勢排名前三位的是《紐約時報》駐中國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權威中心指數.21；原《華爾街日報》的駐華記者、北京站站長、中國分社社長張彥(Ian Johnson)，權威中心指數.20；《紐約時報》中國問題編輯，美聯社前中國新聞總監黃敬齡(Gillian Wong)，權威中心指數.20。該子網絡如圖一。

智庫型美國中國通社會網絡中，33個節點總計281條連線，網絡密度.53、網絡平均路徑長度1.481。該群體網絡密度最低，網絡平均路徑長度最長，這表明智庫中的中國通聯繫較為鬆散，信息交換效率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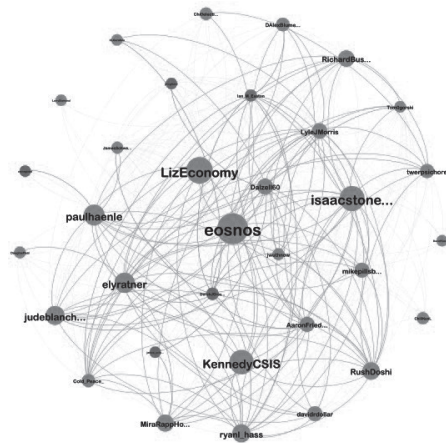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低。其中排名前三位的是布魯金斯學會研究員歐逸文 (Evan Osnos)，權威中心指數.21；美國外交關係協會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易明 (Elizabeth Economy)，權威中心指數.20，和亞洲協會石宇 (Isaac Stone Fish)，權威中心指數.20；該子網絡如圖二：

圖一 記者型美國中國通社交網絡圖



圖二 智庫型美國中國通社交網絡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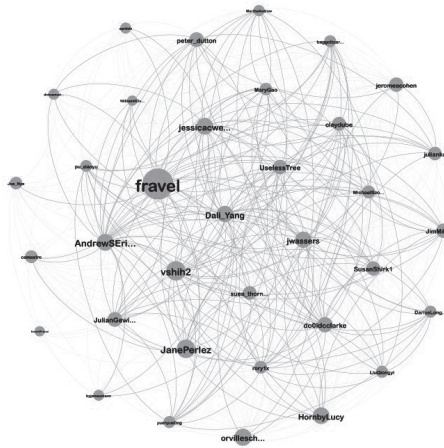


高校學者型美國中國通社會網絡中，35個節點總計413條連線，網絡密度.70、網絡平均路徑長度1.306。該群體的網絡密度和平均路徑長度均排在第二位，值得注意的是，該網絡連線數最多，說明在該群體內部，學者與學者之間有充分的互動，核心與邊緣分野不明顯，信息交換網絡渠道通暢。其中排名前三位的是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教授傅泰林 (M. Taylor Fravel) (.21)；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中國政治與經濟問題專家史宗瀚 (Victor Shih) (.20)；和哈佛大學肖恩斯坦中心學者裴若思 (Jane Perlez) (.20)。如圖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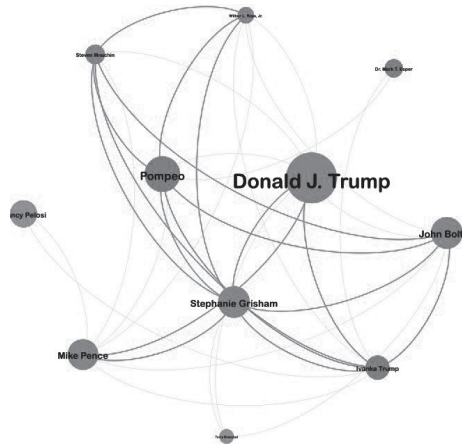
政府官員型美國中國通社會網絡中，11個節點總計35條連線，網絡密度.64、網絡平均路徑長度1.400。該群體雖節點數最少，連線最少，但其網絡密度、網絡平均路徑長度仍排在智庫學者之前，官員與官員之間在社交媒體平台上聯繫較散，不如記者群體活躍，且在信息交流、互惠程度不高。美國前總統唐納德·特朗普 (Donald J. Trump)

排名首位 (.12)；國務卿邁克·蓬佩奧 (Mike Pompeo) (.07)；特朗普前國家安全顧問、美國對外鷹派典型代表約翰·羅伯特·博爾頓 (John Robert Bolton) (.06)。如圖四：

圖三 高校學者型美國中國通社交網絡圖



圖四 政府官員型美國中國通社交網絡圖



整體而言，美國中國通媒體記者、智庫研究員、高校學者、政府官員四個子網絡中，媒體記者網絡密度最高，連接緊密。其次為高校學者，再次為政府官員和智庫研究員。並且以《華爾街日報》記者群體為絕對網絡核心。

為進一步檢測記者型中國通群體區別於其他類型中國通社會網絡的通用性 (generalization)，本研究進行了獨立樣本 t 檢定，得到更普遍情況下兩類資料差異情況。根據檢測結果，記者型美國中國通的網絡密度值 (.78) 大於其他三類非記者型美國中國通的網絡密度均值 (.05)，均值差為 .31，說明記者型美國中國通所建立的社會網絡確實要比其他三類非記者型美國中國通更緊密，研究假設一獲得支持。但推廣到更隨機的情況下，如表二 (排列次數 10,000，隨機種子數 7,581， $p = .25 > .05$)，這意味著，當群體內部信息交換資源的相似性較高時，在統計學意義上，記者型美國中國通的社交網絡密度，並不一定比其他類型美國中國通的網絡密度更大。數據情況與檢驗結果如表一、表二。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表一 各類型社會網絡密度統計資料情況對比

研究對象	記者型	非記者型		
		智庫學者	高校學者	政府官員
網絡密度	.78	.53	.69	.64
均值	.78		.62	
標準差	.00		.07	
總計	.78		.86	
最小值	.78		.53	
最大值	.36		.69	
觀察數量	1		3	

註：排列次數：10,000；隨機種子數：7,581

表二 兩類主體社會網絡密度獨立樣本t檢定結果

均值差	單尾檢測		雙尾檢測
	記者型 > 非記者型	非記者型 > 記者型	
.16	.25	1	.20

美國中國通群體內部存在明顯的核心—邊緣分化；媒體記者、高校學者型中國通多位於核心，智庫、政府官員型中國通多位於邊緣

網絡由節點和節點相互連接而成，並遵循「網絡化邏輯」(networking logic)。信息、物質，甚至權力都會在社會網絡內進行交換、流動。由於個體擁有資源的不均衡，這種流動勢必會帶來內部「不對等」的結構關係(卡斯特，2018)。交換網絡理論中提到的權力的不平衡概念同樣會在社交網絡平台中體現。因此，本研究借助UCINET軟體中核心—邊緣模型算法，對美國中國通社交媒體網絡結構進行分析。結果顯示，美國中國通群體內部產生明顯核心—邊緣分化，111個網絡節點中，有51個節點處於核心位置，而處於邊緣位置的節點有60個。

I. 核心群體特點：媒體記者多處於核心，高校學者其次

在51個核心節點中，20位是媒體記者，高校學者有18人，智庫研究員佔13人。媒體記者中八位來自《華爾街日報》、五位來自《紐約時

報》；《華盛頓郵報》和彭博通訊社分別有三位屬於中國通核心群體。可以看出，美國主流媒體記者中有一群對中國有深入研究的專家，他們在新聞媒體中發佈報導，並積極發表自己觀點，其信息資源吸引到來自整個中國通群體的注意，影響整個群體網絡內信息資源的流向。高校學者中，哈佛大學學者居於核心位置數量最多，有三位；其次分別有兩位普林斯頓、康奈爾大學學者，另外還有包括麻省理工、斯坦福在內的一眾美國「常春藤」高校學者，都處於美國中國通核心位置，其在中國通群體中的資源佔有能力不容小覷。

II. 邊緣群體特點：美國政府官員、智庫學者多位於邊緣，影響力較弱

在中國通社交網絡邊緣，智庫群體中的卡內基和平基金會、蘭德公司和亞洲協會的研究員較多，表明智庫研究員在社交媒體上並不活躍，信息發佈頻度較低，這可能與其機構規模、工作重點有一定關聯。美國政府官員處在邊緣群體的中國通有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副總統彭斯，以及國防部長、商務部長等人。

為進一步觀察記者型美國中國通和非記者型美國中國通的核心邊緣位置關係是否在統計學意義上存在相關性，本研究對中國通類型進行了卡方檢驗，檢驗結果如表三。皮爾遜卡方一漸進顯著性（雙側）係數為.002， $\chi^2 = 9.722$ ，具有統計學意義，研究假設二獲得支持。記者型美國中國通與其身處的網絡核心位置存在高度相關性，即相較於其他非記者型中國通，記者型中國通更多地會佔據網絡結構的核心位置，形成權力結構的優勢一方。

表三 美國中國通類型與核心—邊緣卡方檢驗

	值	自由度	漸進顯著性 (雙側)	精確顯著性 (雙側)	精確顯著性 (單側)
皮爾遜卡方	9.722 ^a	1	.002		
連續性修正 ^b	8.459	1	.004		
似然比(L)	9.706	1	.002		
費希爾精確檢驗				.003	.002
線性關聯	9.639	1	.002		
有效個案數	111				

註：^a 0 個儲存格 (0.0%) 的期望計數小於 5。最小期望計數為 13.56；^b 僅針對 2x2 表進行計算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美國中國通信息交換網絡分為三個模塊，記者—學者模塊形成權力優勢一方；但具有一定隨機性

由於網絡節點自身擁有信息資源程度的差異，伴隨交換行為，會建構出不同的關係，節點之間進一步凝聚，進而形成分組的模塊(module)。模塊度(modularity)是一種常用的衡量節點分組品質的標準，模塊度越高說明所檢測到的社團越符合「內緊外鬆」的特徵，分組品質越好。Mark Newman (2006)提出了一種經典的社團檢測方法——模塊度最大值法(modularity maximization)。它通過考察網絡中所有可能的節點分組，找到使得模塊度最大的分組方式。通常模塊度取值範圍在[-0.5,1]之間，越接近1，說明網絡劃分的品質越好。本研究借助R語言igraph包對美國中國通模塊度值進行測量，結果為.03。

表四 美國中國通各模塊組成節點

模塊	節點類型	數量
模塊一	智庫研究員	20
	高校學者	10
	媒體記者	1
	共計	31
模塊二	政府官員	11
	智庫研究員	6
	媒體記者	6
	高校學者	2
模塊三	共計	25
	媒體記者	25
	高校學者	23
	智庫研究員	7
	共計	55

據表顯示，三個模塊分別由三類不同類型的中國通主要構成：模塊一以智庫研究員為主；模塊二以政府研究員為主；模塊三由媒體記者和高校學者為主。由此可見，在美國中國通交換網絡內部，智庫研究員、政府官員，以及媒體記者—高校學者各自形成了明顯的交換網絡子群體。其中模塊三——由記者和學者組成的群體數量最多，也在

整個交換網絡內佔有最多信息資源，從而形成權力關鍵子群，研究假設三獲得支持。

為了進一步獲知 modularity 的數值是否為隨機解析產生，本研究運用 R-Studio 生成了 Erdos-Renyi 隨機網絡圖 ($n = 111, m = 4,940$)，檢驗在隨機種子為 1,000 的情況下，美國中國通信息交換網絡的 modularity 數值是否小於隨機網絡圖的 modularity 值。根據計算，隨機網絡圖的 modularity 為 .005，明顯小於 .03 美國中國通社交網絡的解析值，說明目前美國中國通構建的信息交換網絡中，各個模塊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隨機性。

討論與結論

主要研究發現

結果顯示，研究假設一獲得支持，但不具備隨機性（排列次數 10,000，隨機種子數 7,581， $p = .25 > .05$ ）；研究假設二獲得支持（ $p = .002 < .05$ ， $\chi^2 = 9.722$ ）；研究假設三獲得支持（modularity = .03），但模塊的分化具備一定隨機性（modularity = .005 < .03）。

具體而言，針對研究假設一，本研究發現記者、學者、研究員、官員四類美國中國通在 Twitter 上建立了緊密連接信息資源交換網絡，網絡密度達到 .36。其中相較於智庫研究員、高校學者、政府官員的網絡密度，記者型中國通子網絡最高，聯繫最為緊密，但並未呈現統計學相關性。

針對研究假設二，本研究發現四種類型的美國中國通在其群體內部分化出明顯的「核心—邊緣」結構，媒體記者、高校學者型中國通佔據核心，智庫、政府官員型中國通多位於邊緣，社交圈層分化較為明顯。結合研究發現一，美國中國通群體內，記者型美國中國通內部既高度聚集，又整體位於中國通網絡的核心，說明記者型美國中國通群體內存在緊密的信息交換，處於美國中國通信息交換網絡的權力核心。

針對研究假設三，本研究發現，美國中國通信息交換網絡內劃分為三個子群，分別由不同類型的中國通主導。其中，記者—高校學者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組成的子群佔據了整個信息交換網絡的大部分位置，形成了權力結構中的優勢一方。但隨機網絡圖的modularity值為.005，各個子群的形成具有一定的隨機性。

整體說來，社交媒體時代，記者型中國通利用社交媒體平台形成了當代中國通信息交換網絡的權力優勢。社交媒體平台作為一種權力制度性基礎，在美國中國通信息資源交換網絡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

交換網絡中記者群體的結構與權力來源

記者型中國通群體之所以能把控美國中國通信息交換網絡絕對核心，與其本身職業所具備的特點不無關係。美國記者以「看門狗」(watchdog)和「釋疑者」(interpreter)而聞名(Weaver, Willnat, & Wilhoit, 2018)，他們通常以調查政府訴求、解構社會問題和審議國家政策來履行其社會職能。此種職業特徵賦予他們第一手信息資源，加之社交媒體平台隨時都可「發表」，且無嚴密的審查流程，無疑讓該群體在交換的過程中佔盡先機。對於此類中國通而言，並非人人都有了解中國的渠道、資源，作為信息「掮客」(broker)，記者群體便在交換中形成自身權力地位，整合著中國通群體內涉華意見流向及內容。因此，要理解這些記者群體為何能夠佔據結構優勢、權力優勢，需要對他們個人社會背景進行挖掘。

歐逸文(Evan Osnos)，曾在中國生活了八年，該經歷為他提供了有關中國的第一手知識，基於此，他撰寫了《野心時代：在新中國追求財富、真相和信仰》(*Age of ambition: Chasing fortune, truth, and faith in the new China*)一書，介紹了關於中國社會的另一面，吸引了大量讀者，並給他帶來了逾8.9萬Twitter粉絲。在111位美國中國通中，歐逸文擁有82條指入連結，位居首位，這意味著超過七成的同儕在關注他的動向，其中以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高級研究員、能說一口流利普通話的石宇(Isaac Stone Fish)和《紐約時報》編輯、有著十年在華報導經驗的黃敬齡(Gillian Wong)為代表。總體而言，歐逸文的關注者主要來自新媒體的從業人員，由互聯網企業家、作家、製片人、歌手和非

政府組織組成，所有這些個體、組織都構成了歐逸文在 Twitter 上的社交網絡權力來源。

儲百亮 (Chris Buckley) 是澳大利亞籍的《紐約時報》記者，在中國待了 24 年之久，因發佈大量有關中國新疆地區的實地調查報告而成爲知名美國中國通。他認爲「中國變成了一個越來越難報導的國家。管控越來越嚴、越來越集中、也越來越專制。」在 Twitter 上，他吸引了 17,000 多名關注者，指入連結 78 條，位居第二位。在他的社會網絡中，包括易明 (Elizabeth Economy) 和張彥 (Ian Johnson) ——前者是外交關係委員會中國研究高級研究員，於 2018 年 6 月被《政治雜誌》(*Politico Magazine*) 評選爲「對華政策至關重要的十個名字之一」(Robertson, 2018)，而後者則是普利策獲獎者，也是《華爾街日報》的記者，他早在 1984 年就來到中國，並在中國生活了 10 年之久，以報導中國境內法輪功活動而聞名。

傅泰林 (M. Taylor Fravel) 是第四代美國中國通的代表，以其在中國南海問題上的專業知識而聞名。他在推特上擁有 32,000 餘位關注者，其中 82 位都在美國 111 位中國通群體內，包括歐逸文。在他的關注者中，有《華盛頓郵報》的中國編輯潔西嘉·陳·威斯 (Jessica Chen Weiss)；研究中國精英政治、經濟和金融專家史宗瀚 (Victor Shih)，亞洲協會高級研究員石宇 (Isaac Stone Fish)。

社交媒體：作為權力的制度性基礎

對美國中國通而言，擁有涉華信息資源優勢本身其實並不能構成其本身的權力地位。交換理論家認爲，任何資源，只有在某一制度環境下被需求，個體才會被驅動進行交換，進而產生權力，即權力的產生需要具備制度性基礎 (華萊士、沃爾夫，2008)。對美國中國通而言，記者群體所佔有的涉華信息資源之所以有交換價值，並非其信息本身具有價值，而是處在中美兩國戰略背景下，雙方博弈對抗而產生的對華信息需求的情況下，而具有價值。但是，此種國際關係層面、信息需求層面的基礎也只是促使該群體涉華信息具備價值的其中一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面，作為技術平台，社交媒體實際上也成為了賦予信息以價值的制度性基礎之一。社交媒體並不只是簡單的技術平台，對於美國中國通而言，為形成影響力或權力，他們不得不通過社交媒體實現跨越時空的信息交換、連接，以此達到目的。

媒介化社會帶來的是「連接一切」(郭凱天，2016)、「永久線上，永久連接」(周葆華，2020；Vorderer & Kohring, 2013)的人類生活場景，電子信息載體的興起，可替代性信息載體的隕落，意味著人們很難脫離電子化信息生活於當前網絡社會。如果沒有社交媒體網路媒介平台，美國中國通將難以第一時間獲得最新動態，必將很大程度上削弱他們的社會聲望，影響其職業生涯。因此，若要在激烈的同儕競爭中取得領先地位，如何獲得發達的信息獲取渠道是他們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對於整個美國中國通群體，擁有社交媒體帳號、建立連接，積極在社交媒體發聲已經成為他們在這個時代的集體性規則或制度。而記者型美國中國通由於其更敏銳的時代嗅覺、更專業的媒介素養，很容易適應此制度，進而在社交媒體空間內形成自己的結構位置，以及權力網絡。

最後，本研究結合了交換網絡理論和社會網絡分析法對不同類型美國中國通的信息交換網絡權力結構進行了分析，在發掘出美國對華輿論的關鍵整合者的同時，還揭示了美國中國通信息資源交換如何影響其內部網絡結構位置以及權力分佈，最終提出社交媒體是權力生成的制度性基礎，豐富了該理論在新媒介環境下的適用範疇，為理解現實/網絡世界權力結構的差異提供了新鮮視角。

研究局限與未來建議

本文的研究局限之一體現在，對美國中國通的網絡權力結構的認知僅通過研究其在社交網絡中的結構特徵。美國中國通的人口學變數、個體政治效能、社交媒介使用行為和社交媒體文本內容同樣值得關注。未來研究可以結合美國中國通社交媒體涉華輿論文本、使用行為等，通過大數據與自我報告數據相結合、量化質化相結合方法更全面揭示美國中國通信息交往網絡結構及其權力關係。

與此同時，伴隨中美競爭，美國對華政策日趨激進，美國中國通內部也出現代際衝突——老一代美國中國通則更傾向與中國求同存異，理解中國，而新生代美國中國通對華態度更加尖銳。然而，老一代美國中國通因社交媒體素養缺乏，仍然以人際影響力影響美國涉華觀點；擁有更高媒體素養的新一代美國中國通（多數處於40至50歲）在社交網絡上佔據了美國對華主流輿論的制高點。因此，未來研究應充分關注不同代際美國中國通的群體特徵和內部的權力關係。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Chinese Section)

- 王莉麗 (2017)。〈美國智庫的核心競爭力分析〉。《智庫理論與實踐》，第2卷第1期，頁10-15、32。
- Wang Lili (2017). Meiguo zhiku de hexin jingzhengli fenxi. *Zhiku lilun yu shijian*, 2(1), 10-15, 32.
- 李原 (2009)。〈氣候變化與中美關係——李侃如博士訪談〉。《國際政治研究》，第30卷第4期，頁82-89。
- Li Yuan (2009). Qihou bianhua yu Zhongmei guanxi—Li Kanru boshi fangtan. *Guoji zhengzhi yanjiu*, 30(4), 82-89.
- 呂增奎 (2015)。〈從「中國崩潰論」看美國對中國研究的誤區〉。《紅旗文稿》，第10期，頁16-17。
- Lü Zengkui (2015). Cong “Zhongguo bengkuai lun” kan Meiguo dui Zhongguo yanjiu de wuqu. *Hongqi wengao*, 10, 16-17.
- 周葆華 (2020)。〈永久線上、永久連接：移動互聯網時代的生活方式及其影響因素〉。《新聞大學》，第3卷，頁84-106、120。
- Zhou Baohua (2020). Yongjiu xianshang, yongjiu lianjie: Yidong hulianwang shidai de shenghuo fangshi jiqi yingxiang yinsu. *Xinwen daxue*, 3, 84-106, 120.
- 姚瑤 (2010)。〈活躍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卜睿哲〉。《對外傳播》，第12期，頁62。
- Yao Yao (2010). Huoyue de Meiguo Zhongguo wenti zhuanjia: Bu Ruizhe. *Duiwai chuanbo*, 12, 62.
- 相德寶、張文正 (2017a)。〈全球媒體社交網絡轉型：網絡、結構和影響力——基於全球報紙社會網絡的分析〉。《新聞界》，第12期，頁85-9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 Xiang Debao, Zhang Wenzheng (2017a). *Quanqiu meiti shejiao wangluo zhuanxing: Wangluo, jiegou he yingxiangli—Jiyu quanqiu baozhi shehui wangluo de fenxi*. *Xinwen jie*, 12, 85–90.
- 相德寶、張文正 (2017b)。〈新媒體時代全球媒體傳播格局及其社交網絡影響力研究〉。《當代傳播》，第4期，頁45–48。
- Xiang Debao, Zhang Wenzheng (2017b). *Xinmeiti shidai quanqiu meiti chuanbo geju jiqi shejiao wangluo yingxiangli yanjiu*. *Dangdai chuanbo*, 4, 45–48.
- 相德寶、張文正 (2018)。〈新媒體時代全球智庫社交網絡影響力探析〉。《國際展望》，第10卷第1期，頁129–146、153–154。
- Xiang Debao, Zhang Wenzheng (2018). *Xinmeiti shidai quanqiu zhiku shejiao wangluo yingxiangli tanxi*. *Guoji zhanwang*, 10(1), 129–146, 153–154.
- 相德寶、樂文婉 (2019)。〈基於社會網絡分析的全球政治領導人社交網絡影響力研究〉。《新聞記者》，第4期，頁43–51。
- Xiang Debao, Yue Wenwan (2019). *Jiyu shehui wangluo fenxi de quanqiu zhengzhi lingdaoren shejiao wangluo yingxiangli yanjiu*. *Xinwen jizhe*, 4, 43–51.
- 特納·喬納森 (2006)。《社會學理論的結構》(邱澤奇、張茂元譯)。北京：華夏出版社。(原著 Jonathan, T. [2006]. *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 Tena Qiaonasen (2006). *Shehuixue lilun de jiegou* (Qiu Zeqi, Zhang Maoyuan, Trans.). Beijing: Huaxia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Jonathan, T. [2006]. *The structure of sociological theory*. California: Wadsworth Publishing.)
- 孫中欣 (2009)。〈哈佛「中國通」談中國研究與中國模式——傅高義教授專訪〉。《國際社會科學雜誌(中文版)》，第26卷第1期，頁5–10。
- Sun Zhongxin (2009). *Hafo “Zhongguo tong” tan Zhongguo yanjiu yu Zhongguo moshi—Fu Gaoyi jiaoshou zhuanfang*. *Guoji shehui kexue zazhi (Zhongwen ban)*, 26(1), 5–10.
- 唐昆凡 (2014)。〈蘭普頓談治理中國：國內問題是第一要務〉。《社會觀察》，第4期，頁72–73。
- Tang Kunfan (2014). *Lan Pudun tan zhili Zhongguo: Guonei wenti shi diyi yaowu*. *Shehui guan cha*, 4, 72–73.
- 馬建標、楊康書源 (2018)。〈冷戰祛魅：1966年美國中國通的「時代證詞」及其國家角色的反思〉。《南京政治學院學報》，第34期，頁78–87、141。
- Ma Jianbiao, Yang Kangshuyuan (2018). *Lengzhan qumei: 1966 nian Meiguo Zhongguo tong de “shidai zhengci” jiqi guojia jue de fansi*. *Nanjing zhengzhi xueyuan xuebao*, 34, 78–87, 141.

- 郭凱天 (2016年1月15日)。〈連接一切：移動互聯網如何影響中國社會〉。取自互聯網前沿，<https://www.tisi.org/16460>。
- Guo Kaitian (2016, January 15). Lianjie yiqie: Yidong hulianwang ruhe yingxiang Zhongguo shehui. *Hulianwang qiany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isi.org/16460>.
- 張威 (2006)。〈光榮與夢想的終結：美國「中國通」記者的命運及麥卡錫主義〉。《新聞與傳播研究》，第4期，頁18–27、94。
- Zhang Wei (2006). Guangrong yu mengxiang de zhongjie: Meiguo “Zhongguo tong” jizhe de mingyun ji Maikaxi zhuyi. *Xinwen yu chuanbo yanjiu*, 4, 18–27, 94.
- 梁怡、王愛雲 (2010)。〈西方學者視野中的國外中國問題研究——訪美國喬治·華盛頓大學教授沈大偉〉。《中共黨史研究》，第4期，頁86–93。
- Liang Yi, Wang Aiyun (2010). Xifang xuezhe shiye zhong de guowai Zhongguo wenti yanjiu—Fang Meiguo Qiaozhi Huashengdun Daxue jiaoshou Shen Dawei. *Zhonggong dangshi yanjiu*, 4, 86–93.
- 曼紐爾·卡斯特 (2018)。《傳播力》(湯景泰、星辰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原著Manuel, C.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anniuer Kasite (2018). *Chuanbo li* (Tang Jingtai, Xing Chen, Trans.). Beijing: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Manuel, C. [2009].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華萊士·露絲·沃爾夫·愛麗森 (2008)。《當代社會學理論：對古典理論的擴展》(劉少傑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原著Wallace, R., & Wolf, A. [2005].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Expanding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Hoboken: Prentice Hall.)
- Hualaishi Lusi, Woerfu Ailisen (2008). *Dangdai shehuixue lilun: Dui gudian lilun de kuozhan* (Liu Shaojie, Trans.). Beijing: Zhongguo renmin daxue chubanshe. (Original book: Wallace, R., & Wolf, A. [2005]. *Contemporary sociological theory: Expanding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Hoboken: Prentice Hall.)
- 黃濤 (2019)。〈論費正清及其中國學研究對中美邦交的文化貢獻〉。《井岡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0卷第4期，頁108–115。
- Huang Tao (2019). Lun Fei Zhengqing jiqi Zhongguoxue yanjiu dui Zhongmei bangjiao de wenhua gongxian. *Jinggangshan daxue xuebao (Shehui kexue ban)*, 40(4), 108–115.

英文部分 (English Section)

- Anger, I., & Kittl, C. (2011). Measuring influence on Twitter. *i-KNOW' 11: Proceedings of the 11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knowledge management and knowledge technologies* (pp. 1–4). New York: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 Anstead, N., & Chadwick, A. (2017). A primary definer online: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pagation of a think tank's authority on social medi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0*, 246–266.
- Biden, J. (2021, February 4). *Remarks by President Biden 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hitehouse.gov/briefing-room/speeches-remarks/2021/02/04/remarks-by-president-biden-on-americas-place-in-the-world/>.
- Cohen, P., & Goldman, M. (1992). *Fairbank remembered*. Cambridge, MA: John K. Fairbank Center.
- Collins, R. (1988). *Theoretical sociology*. San Diego, CA: Harcourt College Pub.
- Cook, K., & Emerson, R. (1978). Power, equity and commitment in exchange network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3*, 721–739.
- Cook, K., Emerson, R., Gillmor, M., & Yamagishi, T. (1983). The distribution of power in exchange networks: Theory and experimental result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89*, 275–305.
- Cook, K., & Whitmeyer, J. (1992). Two approaches to social structure: Exchange theory and network analysi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8*, 109–127.
- Emerson, R. (1962). Power-dependence relatio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7*, 31–41.
- Emerson, R. (1972). Exchange theory, part II: Exchange relations and networks. In J. Berger, M. Zelditch, & B. Anderson, *Sociological theories in progress* (pp. 58–87).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 García, M., & Segado, S. (2016). Identifying the new influencers in the internet era: Social media and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Revista Española de Investigaciones Sociológicas, 153*, 23–40.
- Han, E., Kim, K., & Lee, A. (2019). Contributors to exchange structures and their effects on community solidarity in online communities. *Internet Research, 29*, 1066–2243.
- Hsieha, S., & Leeb, C. (2020). Traces of mobility: Examining location disclosure on social networks with mobile location tagging. *Telematics and Informatics, 49*, 1–14.
- Huang, H., Cheng, T., Huang, W., & Teng, C. (2018). Impact of online gamers personality traits on interdependence, network convergence, and continuance inten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38*, 232–242.
- Hughes, A., & Wojcik, S. (2019, August 2). *10 facts about Americans and Twitte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9/08/02/10-facts-about-americans-and-twitter/>.

- Jacobs, L., & Page, B. (2005). Who influences U.S. foreign poli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99, 107–123.
- Kapferer, B. (1972). *Strategy and transaction in an African factory: African workers and Indian management in a Zambian town*.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 Kleinberg, J. (1999). Authoritative sources in a hyperlinked environment. *Journal of the ACM*, 46, 604–632.
- Laumann, E., Knoke, D., & Kim, Y.-H. (1985). An organizational approach to state policy formati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nergy and health domain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50, 1–19.
- Mark, C.-K. (2005). American “China Hands” in the 1950s. In C.-Y. Chu (Ed.), *Foreign communities in Hong Kong, 1840s–1950s* (pp. 171–193). Springer: Berlin, Germany.
- McNulty, T. (1993). Television’s impact on executive decisionmaking and diplomacy. *Fletcher Forum of World Affairs*, 17, 67–83.
- Mills, C. (1956). *The power elit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tchell, J. (1974). Social networks.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3, 279–299.
- Newman, M. (2006). Modularity and community structure in network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103(23), 8577–8582.
- Robertson, D. (2018, June 11). *The 10 names that matter on China polic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olitico.com/magazine/story/2018/06/11/the-10-names-that-matter-on-china-policy-218673/>.
- Schmalzer, S. (2009). Speaking about China, learning from China: Amateur China experts in 1970s America.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6, 313–352.
- Schreckinger, B., & Lippman, D. (2018, December 2). *The China hawk who captured Trump’s “very, very large brai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politico.com/story/2018/11/30/trump-china-xi-jinping-g20-michael-pillsbury-1034610>.
- Scott, J. (2000).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A handbook*. Thousand Oaks, CA: SAGE Publications Ltd.
- Shambaugh, D. (2015, March 6). *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sj.com/articles/the-coming-chinese-crack-up-1425659198>.
- Thomson, J. (1971). Watching the China-watchers. *Foreign Policy*, 4, 138–147.
- Vorderer, P., & Kohring, M. (2013). Permanently online: A challenge for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7, 188–196.
- Weaver, D., & Willnat, L. (2016). Changes in U.S. journalism: How do journalists think about social media? *Journalism Practice*, 10, 844–855.
- Weaver, D., Willnat, L., & Wilhoit, G. (2018). The American journalist in the digital age: Another look at U.S. news people. *Journalism &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96, 101–130.

《傳播與社會學刊》，(總)第59期(2022)

Yuan, Z., & Fu, Q. (2020). Narrative frami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threat construction of rivals.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13, 419–453.

本文引用格式

相德寶、曹春曉(2022)。<〈交換、信息與權力：美國「中國通」社交媒體社會網絡研究〉。《傳播與社會學刊》，第59期，頁119–146。